



大会

Distr.: General
1 September 200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五十九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107(a)

人权问题：人权文书的执行情况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各会员国转递人权委员会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特奥·范博芬依照大会 2003 年 12 月 22 日第 58/164 号决议提出的临时报告。

* A/59/150。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是依照大会第 58/164 号决议和人权委员会第 2004/41 号决议提出的。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中提到他向人权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提出的主要报告及其三个增编（E/CN.4/2004/56 和 Add. 1-3）以及他自提出它们以来所进行的活动。他并阐述了他特别关心的问题，尤其是与他任务范围内的问题有关的整体趋势和事态发展。

在作为提交大会前几届会议的关于在反恐怖主义措施方面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的报告的后续报告中，特别报告员首先提请注意有人企图规避此项禁令的绝对不容减损性质。然后他就讨论不驱回原则并且回顾此项原则所根据的法学理论；他还指出破坏此项原则的实例已有所增加。最后，特别报告员提请注意酷刑受害者所面临的最通常的后果。除了受害人身体和心理均受伤害之外，酷刑的后果还影响到受害人的家人和整个社区。因此，为了制订适当的协助方式，必须全方位地了解酷刑对其受害人的影响。

目录

	段次	页次
一. 导言	1-12	4
二. 绝对、无减损地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 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13-24	5
三. 不驱回原则	25-42	8
四. 酷刑对受害者的影响	43-60	12

一. 引言

1. 本报告是人权委员会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向大会提出的第六次报告。本报告是依照大会第 58/164 号决议和委员会第 2004/41 号决议提出的。这是现任特别报告员特奥·范博芬提出的第三次报告。本报告包含有特别报告员特别关注的问题，尤其是与他任务范围内的问题有关的整体趋势和事态发展。

2. 特别报告员提请注意他向人权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提出的报告（E/CN.4/2004/56 和 Add. 1-3），他在报告中回顾了对被剥夺自由者的许多保障，以保护他们免遭酷刑和其他形式虐待的威胁；探讨了艾滋病毒/艾滋病与酷刑的问题；还载入了特别报告员关于专门用来施以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的器具的交易和生产情况、其产地、目的地及种类的初步研究报告（E/CN.4/2003/69）的一些后续情况。主要报告的附件载有三名历任特别报告员提交的报告的索引。

3. 正如同他向委员会提交的报告的增编 1（E/CN.4/2004/56/Add. 1）所述，2002 年 12 月 15 日至 2003 年 12 月 15 日期间，特别报告员向 76 个国家的政府发出 154 封信函，内载有关酷刑的具体指控或酷刑的一般情况。特别报告员还发出 71 封信，提醒有关政府注意前几年递送的案件。此外，特别报告员为一些已表示恐怕会受到酷刑和其他形式的虐待之害的人向 80 个政府发出 369 次紧急呼吁。除了关于信函的年度增编之外，特别报告员还印发了一件关于对进行各次国家访问后所作的建议的后续活动情况的增编（E/CN.4/2004/56/Add. 3）。

4. 特别报告员应西班牙政府邀请，于 2003 年 10 月 5 日至 10 日访问了该国。他在访问期间会晤了一些政府官员和民间社会组织的代表以及据称的酷刑受害人及其亲属（见 E/CN.4/2004/56/Add. 2）。特别报告员表示感谢西班牙政府在他访问期间向他提供充分的合作。特别报告员的结论是，在西班牙，酷刑或虐待不是蓄意性的，但是现行的制度会发生酷刑或虐待，特别是对由于涉及恐怖主义的活动而被单独拘留的人施加酷刑或虐待。因此，他建议政府采取若干措施，以兑现它关于防止和制止酷刑和其他形式的虐待的承诺。

5. 自从特别报告员向人权委员会提交该报告以后，2003 年 12 月 16 日至 2004 年 7 月 31 日期间，他向 42 个国家的政府发出 94 封信函，内载有关酷刑的指控。此外，特别报告员为一些可能会受到酷刑或其他形式的虐待的人向 58 个政府发出 237 次紧急呼吁。

6. 关于实况调查，特别报告员曾预期可在 2004 年 6 月底前往中国作为期二周的访问。然而，应中国政府的要求，此行已推迟至 2004 年年底。特别报告员仍然在正面考虑玻利维亚、格鲁吉亚、尼泊尔和巴拉圭政府发送来的前去进行实况调查访问的邀请。因为相关各国政府无法控制的原因，这些访问尚未实现。他遭

憾地表示，他在较早时请求访问阿尔及利亚、埃及、赤道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以色列、俄罗斯联邦（就车臣共和国）、突尼斯和土库曼斯坦，但仍未获得结果。2004 年 1 月，他曾连同人人有权享有最佳身心健康问题特别报告员一道请求访问关塔纳摩湾的美利坚合众国海军基地。

7. 特别报告员就关于联军虐待伊拉克囚犯的报告向新闻界发表了声明（2004 年 5 月 3 日），并且宣布他已推迟了对中国的访问（2004 年 6 月 16 日）。他还就下列事项，连同另一些特别程序特别报告员一道多次向新闻界发表声明：尼泊尔境内的人权情况（2004 年 3 月 9 日和 7 月 14 日）及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普遍的虐待事件（2004 年 3 月 26 日）和就调查一位新闻记者的死亡事件吁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遵守人权规范（2004 年 7 月 27 日）。

8. 2004 年 2 月 26 日，特别报告员在日内瓦基金会 2004 年度颁奖典礼上讲了话，该年度奖颁给了防止酷刑协会和世界禁止酷刑组织。

9. 2004 年 4 月 25 日至 27 日，特别报告员参加了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在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奥赫里德举办的关于被拘禁者和囚犯待遇的国际和国内义务的训练讨论会。在会上讲话的人员除了特别报告员外还包括欧洲人权法院和欧洲防止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委员会的代表以及当地的法律专家。

10. 2004 年 5 月 18 日，特别报告员因为他在人权领域内的成就和领导才干及其担任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的功能而受到 Bellevue 医院/纽约大学酷刑幸存者方案的表扬；该方案向来自 70 个国家的 1 000 多名酷刑幸存者提供了多学科治疗服务。

11. 2004 年 6 月 21 日至 25 日，特别报告员主持了人权委员会特别程序和咨询服务方案特别报告员/代表、独立专家和工作组主席第十一次会议。该次会议的报告载于 E/CN.4/2005/5。

12. 2004 年 6 月 26 日，时值联合国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的日子，特别报告员会同禁止酷刑委员会、联合国援助酷刑受害者联合国自愿基金董事会和联合国人权事务代理高级专员发表了联合声明。

二. 绝对、无减损地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13. 特别报告员在他向大会提交了前几次报告之后已十分关切地收到关于企图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借口来规避禁止酷刑和其他形式的虐待的绝对性质的指称，特别是关于讯问及拘禁囚犯的情况者。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谨提请注意他前几次报告（见 A/57/173，第 2 至 35 段和 A/58/128，第 11 至 22 段）。

14. 最近有人提出了引用了国内法上关于必要性和自卫的法律上的理由，企图作为可使涉嫌对恐怖主义行为嫌犯实施了或教唆、实施酷刑的官员免除刑事责任的辩解。尽管意识到恐怖主义的威胁并且承认国家有责任保护其公民和国家安全不致遭受此类威胁之害，但是特别报告员希望重申，禁止酷刑和其他形式的虐待方面的绝对性质正意味着不得为了为酷刑辩解而援引任何例外情况，不论是战争状态或是战争威胁、国内政治动荡或任何其他社会紧急状态。

15. 纵容酷刑本身就构成对酷刑禁令的违背。此外，不应当援引国内法作为对不遵守国际条约义务和习惯国际法的辩解。特别报告员希望回顾，按照国际法，不应当认为准许实施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行政、立法、管理或司法措施都有可能被视为是合法的；因此，任何此类措施都会导致国家责任，不论该措施是否为政府官员或代表该国家以公务身份行事的任何其他人员直接实施、教唆、认可或默许的酷刑行为。因此，亦以其担任总指挥官身份行事的国家元首不应当授权其下属使用酷刑或向实施酷刑的行为人、共犯和同谋者提供豁免保障。亦不应接受另一种辩解，即曾有律师或专家告知使用酷刑的政府官员说其行为是可容许的。不得援引任何特殊情况来辩解违反了制止因任何理由实施酷刑的禁令，包括出于上级官员或政府机关的命令而为之者。¹

16. 特别报告员十分关注地注意到已有人企图限制《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1 条内载酷刑的定义的范围。例如，据报另有其他的文件将酷刑界定为难以忍受的身体痛苦而且应当等同于随伴而生的人身重伤痛苦，诸如器官坏死、人身功能失效，或甚至死亡。同样，据报有人辩称，某些粗暴的方法不应被视为酷刑，而仅仅是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故不应受到绝对禁止，而且在特殊情况下是可被容许的行为。特别是据报有人主张可被容许的讯问方法可包括剥夺人类基本需要、以湿布使人窒息和以死亡相威胁。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希望着重指出，各种事件或各国的意志或利益都不应导致改变《公约》内载的定义。特别报告员还希望指出，禁令同样适用于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17. 特别报告员最近收到了关于用于从恐怖主义行为嫌犯获得情报的被宽恕的一些方法的资料。这些方法主要包括：将被拘禁者置于痛苦和（或）受压迫的姿态；长时间不让睡觉和用光线照射；将他们置于高温中、极冷中、喧闹中和强光中；戴上头罩；不让穿衣服；脱光被拘禁者和以恶犬相威胁。国际和区域人权机制的法学文献都一致认为这些方法都违反了禁止酷刑和虐待的禁令。1997 年，禁止酷刑委员会的结论是，“这些方法[包括]：(1) 监禁在非常痛苦的条件下，(2) 特别情况下戴头罩，(3) 长久喧闹的音乐，(4) 长时间不让睡觉，(5) 恐吓，包括死亡恐吓，(6) 猛摇身体，和(7) 吹冷风冷冻；……按照委员会的看法，这些都违反了第 16 条的规定，并构成《公约》第 1 条所规定的酷刑。在这类讯问方法合并使用时，这项结论特别明显”。² 同样，在 *Loayza Tamayo* 案中，美洲人权法院的判决宣称，“即使无人身伤害，精神和心理上的痛苦加上侦讯时的精神上的不

安得视为不人道待遇。有辱人格的待遇的特色是为了羞辱和低贬被害人和打破其人身与精神上的抵抗而导致的恐惧、焦虑和低劣感觉。……此一情况如果发生在被非法拘禁者身上，则其受害程度会更为严重。……为了确保被拘禁者行为适当而使用并非完全必需的任何暴力都是……违反了《美洲公约》的对该人的尊严的打击。不应当为了调查工作上的紧急需要和反恐怖主义斗争中所遭遇到的不容否认的困难而限制对个人的人身完整权的保护。”

18. 特别报告员希望提醒大会，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对被剥夺自由的人应给予人道及尊重其固有的人格尊严的待遇，虽然这项权利并没有在不可克减权利清单中被提及，但是，委员会却认为不应当规定这项权利须成为《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³ 第 4 条内所订合法克减的对象。

19. 所收到的指控书指出，据报私营承包者已对恐怖主义行为涉嫌者施加了酷刑和虐待。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希望回顾，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只有在缔约国保护个人，而且既防止国家工作人员侵犯《盟约》的权利，又防止私人或者实体采取行动妨碍享受根据《盟约》应在私人或者实体之间实现的权利的情况下，缔约国才能充分履行有关确保《盟约》权利的积极性义务。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由于缔约国没有能够采取适当措施或者未尽职守来防止、惩罚、调查或者补救私人或者实体这种行为所造成的伤害，结果就没有能够按照第 2 条的规定确保《盟约》所承认的权利，最后引起缔约国对这些权利的侵犯”。⁴

20. 对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和人权委员会其他的特别报告员而言，涉嫌犯下恐怖主义行为的人的身份和拘禁条件问题依然都是引起极大关注的议题。发生了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事件之后，包括儿童在内的数以千计的恐怖主义行为嫌犯已被拘禁、毫无机会使其法律地位获得确定，更缺乏律师的辩护。据说其中许多人目前仍然被单独监禁，这本身就可能构成对免受酷刑权的侵犯。⁵ 2004 年 7 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表示它关注有人数不详的人仍旧受到任何法律框架之外的拘禁。

21. 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提及关于在采取反恐措施中保护人权问题委员会特别程序会议最后一天所通过的联合声明，该声明包括一项请求，即希望法官和律师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人人有权享有最佳身心健康问题特别报告员和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访问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关塔那摩湾军事基地被以所谓恐怖主义或其他罪名拘禁的人（见 E/CN.4/2005/5，附件一）。

22. 特别报告员希望重申应当立即废除维持秘密拘留所的做法；任何公职人员把人关押在秘密的和（或）非官方的拘留所，均属犯下可予惩处的罪行。他还回顾人权委员会第 2004/41 号决议，其中委员会提醒所有国家，长期单独关押可能会为施加酷刑提供方便，而这种关押本身就是一种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乃至酷刑，并促请各国尊重人的自由、安全和尊严的保障原则。还应当强调，虽然被拘禁者的地位或许仍旧不明确，但是，已经明确的是应当对他们适用的国际义务、标准和保护以及应当禁止对所有的人施加酷刑，不论其法律地位，而且不

得有例外和差别待遇。特别报告员希望重复他早先的一项建议，即应当规定让所有被拘留者具有向拘留的合法性提出挑战的能力，例如通过人身保护令状或要求保护(行使)宪法权利的办法；并应使这类程序应能迅速运作(见 E/CN. 4/2004/56, 第 39 段)。

23. 特别报告员严重关切最近的一些报告指出，在一些司法程序中，某些国家当局竟然认为可以采纳可能是经酷刑取得的证据。应当回顾，禁止酷刑公约第 15 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类口供可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求逼供的证据。禁止酷刑委员会宣称，“在程序性立法中，防止酷刑的必要手段之一是订立关于不受理非法获取的证词和其他有污点的证据的详细规定”(A/54/44, 第 45 段)。

24. 特别报告员回顾了他本人的一般性建议，还希望提及禁止酷刑非政府组织国际联盟于 2004 年 5 月 14 日发表的声明并表示他完全支持它的建议，特别是它要求应独立、迅速并全面地调查和在证据确凿时起诉每一项所指控的酷刑或其他虐待罪行，以及要求应处罚已证明应负责的任何人员，不论其地位或官阶。他还赞同它所认为的应当全面审查讯问方法，以期确保这些方法符合关于禁止酷刑和虐待的国际标准，还应保证人权观察员都能够顺利地进入世界各地的拘留设施。

三. 不驱回原则

25. 特别报告员在提交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的报告中，曾用一节的篇幅论述在反恐怖主义措施的背景下禁止酷刑和其他形式的虐待，并提出了寻求庇护权、不驱回原则和引渡等问题(见 A/57/173, 第 27 至 35 段)。毋庸置疑，所有人权问题，特别是有关禁止酷刑和其他形式虐待的人权问题，对于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行为和战略的斗争仍然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因此，特别报告员再度探讨这些问题，并希望特别关注可能与其他人权原则一样受到削弱的不驱回原则。

26. 必须回顾，不驱回原则在国际人权法、特别是《禁止酷刑公约》第 3 条中有着坚实的基础。第 3 条规定，“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国家将有遭受酷刑的危险，任何缔约国不得将该人驱逐、遣返或引渡至该国”。同样，人权委员会也在其第 20 号一般性评论中审查了移送、驱逐或驱回与酷刑之间的联系：“缔约国不得以引渡、驱逐或驱回的方式使个人在返回另一国时面临遭受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惩罚的危险”。

27. 对于不驱回原则，各国应承担起根本责任，既要按照《公约》第 2 条第 1 款的规定防止出现对其管辖的任何领土内的人员施行酷刑和其他形式虐待的行为，又要在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人员可能遭受酷刑而不将其移交其他国家控制的情况下防止出现这种行为。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在 *Furundzija* 一案中提出了有力的争辩：“仅仅在施行酷刑后进行干预是不够的，因为人的身心健康已经

受到了无法补救的伤害。因此，各国负有责任制订各项措施，预先制止酷刑的施行”。⁶

28. 不驱回原则是禁止酷刑和其他形式虐待的全面绝对性和强制性的一个固有部分。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回顾欧洲人权法院就 *Chahal 诉联合王国* 一案发表的意见，法院在意见中指出：“（《欧洲人权公约》）第 3 条中禁止虐待的规定，在驱逐案例中具有绝对性。因此，只要有充分理由相信，某人如被移送至另一国将面临遭受违背第 3 条规定的虐待的真实风险，缔约国如果驱逐此人，就有责任保障他不受此种待遇。在这种情况下，该人的活动不论多么令人厌恶或危险，都不能作为实质性考虑因素。”⁷

29. 特别报告员对减损这一原则的做法增多表示严重关切。这种做法之一是一国警察当局在未经司法当局干预、有关个人根本不可能与亲人或律师联系的情况下，向他国的对应机关移送人员。禁止酷刑委员会认识到，各国在打击犯罪的斗争中应加紧合作，并为此商定有效措施，但同时认为这种做法不仅侵犯了按法律程序审判的权利，也违反了《公约》第 3 条的规定。⁸ 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还表示赞同欧洲委员会人权事务专员阐述的意见：在酷刑和虐待风险升高的案例中，导致驱逐的审判工作尤其应该尊重有关的法律保障，至少应在审判中得到听审并享有上诉的权利。

30. 依靠保证是使不驱回原则日益受到损害的又一做法，移送国要求接收国保证，被移交的涉案者不会遭受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特别报告员并不认为，应该完全排除把要求和获得保证作为移交控有恐怖主义罪名或其他罪名者的先决条件。实际上，特别报告员在提交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的报告中，呼吁各缔约国确保在所有相关情况下，在控有恐怖主义罪名或其他罪名者被引渡前，接受国应向引渡当局明确保证，有关个人不会遭受酷刑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虐待，而且已经建立了监督其所受待遇的制度，以确保他们得到充分尊重其人格的待遇（A/57/173，第 35 段）。

31. 然而，向大会提交报告两年以来，特别报告员遇到的若干案例强烈显示，外交保证并未受到尊重，而且据称被移交人员受到的待遇违背了绝对禁止酷刑和其他形式虐待的原则（见 E/CN.4/2004/56/Add.1，第 1827 段）。于是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诉诸保证的做法是否正在成为一种出于政治考虑的、对不驱回原则的替代；我们必须牢记，这项原则是绝对的和不可减损的。欧洲委员会人权事务专员明确指出了依靠外交保证的问题性：寻求外交保证做法的固有弱点在于，如果有寻求这种保证的需要，也就显然认识到了遭受酷刑和虐待的风险。如果风险依然存在，正式保证是微不足道的，这是禁止酷刑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绝对性所决定的。”⁹

32. 特别报告员回顾，安全理事会在第 1373（2001）号决议中决定，除其他外各国对于资助、计划、支持或犯下恐怖主义行为或提供安全庇护所的人应该拒绝给

予安全庇护。他同时注意到，安全理事会第 1456（2003）号决议强调，各国必须确保为打击恐怖主义而采取的任何措施符合国际法规定的全部义务，并应按照国家法，尤其是国际人权、难民和人道主义法采取这种措施。充分尊重国际人权法的基本标准，特别是在采取国家措施和开展国际合作时绝对禁止酷刑，这个问题是特别报告员任务的一部分。特别报告员从这一角度就探讨依靠外交保证问题时应加以考虑的因素和情况提出了若干进一步的考虑。特别报告员无意全面例举这种因素和情况，但是他对不驱回原则不断受到削弱的关切促使他在这方面提出某些要求。

33. 必须铭记国际人权法中制订的基本国际标准，特别是《世界人权宣言》（第 5 条）、《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 7 条）、《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3 条）、《欧洲人权公约》（第 3 条）和《美洲人权公约》（第 5 条）。人权委员会最近在第 31 号一般性评论中重申，缔约国“尊重并确保其境内的所有个人和其控制的所有个人享有盟约权利”的义务包含了以下义务：如有充分理由相信在移送国或任何其他接收国存在《公约》第 6 条和第 7 条设想的遭受不可补救伤害的真实风险，应该不将其引渡、递解、驱逐或以其他方式移送出境”（第 12 段，着重标志为作者所加）。类似的措词也构成了《禁止酷刑公约》第 3 条以及禁止酷刑委员会有关执行该条的第 1 号一般性评论（1996 年）的精髓部分。

34. 不驱回原则要考虑的因素和情况可能涉及接受国或最后接受国存在的情况（当时的政治情况），也可能涉及到当事人遭受酷刑或其他形式虐待的脆弱性（个人情况）。当时的政治情况本身，或亦结合个人情况，是决定是否适用不驱回原则的确定因素。

35. 《禁止酷刑公约》第 3 条第 2 款规定，为了确定是否有充分理由相信一个人将有遭受酷刑的危险，应当考虑到所有有关的因素，包括在适当情况下，考虑到有关国家境内是否存在一贯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这项定义在联合国人权术语中有着悠久的历史，¹⁰ 定义指明了人权委员会需要特别审查的情况的种类和性质。从定义的措词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一个国家存在一贯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并非是唯一的确定因素，这一因素应结合其他相关情况，特别是涉及有关个人脆弱性的情况加以评估。

36. 在对适用不驱回原则时必须考虑的当时政治情况进行评估时，应当参照《禁止酷刑公约》第 20 条的规定。该条规定，如果委员会收到可靠的情报，认为其中有确凿迹象显示有系统地施行酷刑，可对这种案例进行特别调查。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回顾了禁止酷刑委员会对“系统的”酷刑做法作出的定义：“如果据报的酷刑案件明显不是在某一特定地点或特定时间的偶然行为，而是有关国家许多地区惯常、普遍和蓄意的行为，即表示存在着系统的酷刑做法。酷刑的系统性实际上并非由政府的直接意向所致，而可能是政府难以控制的因素所造成的，这

种做法的存在可能表示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政府制订的政策时出现了偏差。立法不够充分，在实践中给使用酷刑造成了漏洞，也加剧了这种做法的系统性。”¹¹

37. 从“一贯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和“系统的酷刑做法”来看，《公约》第 3 条和第 20 条所载的因素和情况有着共同之处，但是前一术语范围更广，而且没有明确界定。在禁止酷刑委员会的努力下，后一术语为本报告提供了更为具体的指导，并且同时包括了作为国家政策和作为政府对其无有效控制的公共当局做法的两种不同的酷刑。特别报告员认为，在适用“系统酷刑做法”定义的情况中，应该严格遵守不驱回原则，而且不应诉诸外交保证。

38. 如上所述，在将会加以考虑的各项因素和情况中，还有被移送者的个人情况。被移送者对酷刑或其他形式虐待的脆弱性必须成为一个确定因素。正如禁止酷刑委员会在就执行公约第 3 条发表的第 1 号一般性评论中指出的，这种因素之一是被移送者是否在（最近的）过去遭受过公职人员施行的酷刑或虐待，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许下施行的酷刑或虐待。另一个因素是，被移送者是否在有关国家的境内外从事过政治活动或其他活动，如果被移送至有关国家，可能特别容易遭受酷刑的风险。

39. 特别报告员还希望提请注意由一个国家可能存在的情况所产生的因素和情况，同时粗略地谈及可能被移送至这种国家的个人的脆弱性。这里提到的个人是指属于可按政治、种族、国籍、族裔、文化、宗教、性别或性取向等其他理由识别的团体或集体，他们因为这一理由成为当局的目标，或在当局的默许下成为目标，并有可能遭受等同于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惩罚的迫害或系统歧视。¹² 在确定不驱回问题时，也应考虑到这些因素和情况。

40. 特别报告员不得不指出，鉴于不驱回原则的强制性和绝对性，他对诉诸外交保证的做法不表示看法，特别是如果这一做法变成了对不驱回原则的替代。然而，特别报告员虽然承认在一些情况和案例中不应预先排除诉诸外交保证的做法，但他同时认为，正如其两年前在其报告(A/57/173)中所指出的，这种保证必须附有明确的保障，即当事人将不会遭受酷刑或其他形式的虐待，而且已经建立了监测其所受待遇的制度。由于保证可能仅仅是空洞的姿态，¹³ 特别报告员提出了一些外交保证在保护不受酷刑和其他形式虐待方面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以使这种保证做到充实、有意义和可核查。

41. 至于被剥夺自由的个人的保障，特别报告员起草了一份基本保障清单，这些保障载于国际人权准则和标准以及前几次报告(E/CN.4/2004/56, 第 27 至 49 段)中的一般性建议。这份基本保障清单必须成为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个人的参照标准，其中的若干保障必须明确纳入接受国提出的保证。因此，保障应该至少包括以下方面：迅速获得律师协助(同上，第 32 段)、对所有审问进行记录(最好通过摄像记录)并对现场所有人员的身份进行登记(同上，第 34 段)、立即接受独

立的体格检查（同上，第 36 段）以及禁止单独监禁或在不明地点监禁（同上，第 37 段）。

42. 最后，应该建立有效的监督制度，以使保障做到可信和可靠。这种监督应该是迅速和定期的，还应包括单独见面。应由独立人士或组织承担这项任务，他们应定期向移送国和接受国的主管当局提出报告。

四. 酷刑对受害者的影响

43. 在执行其任务时，特别报告员不仅收到关于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指控，而且收到关于医疗、心理、社会及其他相关后果的资料。对酷刑各方面或后果的陈述不可能详尽无遗。不过，根据多年来收到的资料，包括在实况调查期间的直接证词，特别报告员想提请注意酷刑受害者所面临的一些最普遍后果。酷刑受害者也往往被称为酷刑幸存者，以确认他们所经历的痛苦遭遇。为此，必须强调使用酷刑的后果之一是，在不少情况下受害者死亡，不论是有意或无意。

44. 特别报告员认为必须查明酷刑对受害者在许多方面的影响，以便更好评估和满足其需要，尤其从医疗和心理的视角来看待，并提出建议保证最适当有效的补救。绝大多数酷刑幸存者都说对其惨痛经历毕生难忘，但无可奈何，只好设法忍受下去。¹⁴

45. 第一名酷刑特别报告员，彼得·科艾曼斯，在向人权委员会提交的第一个报告(E/CN.4/1986/15)中说明，受害者的人格，由人的固有尊严形成，如何被酷刑摧残。他指出，“酷刑破坏个人的身心健全——两者完全相互依存。往往把躯体和精神酷刑区分开来。不过，这一区分，似乎与施加酷刑比其性质较为有关。酷刑，不论如何施加，都一定会影响到心身。即使使用最残忍手段伤害身体，长期后果主要是对心理的影响，即使使用最巧妙手段伤害心理，但总是感到身体剧烈疼痛。一种共同后果是人格分裂(第 4 段)。”除体伤外，使身体痛苦产生恐惧、焦虑、颓丧和屈辱。根据所得资料，施加痛苦还经常伴随着精神压力，例如辱骂、讥笑、有辱人格的待遇、威胁或假装处刑。不论是否同时施加精神压力，使身体痛苦必定造成精神痛苦。因此，只治疗酷刑所造成的体伤是不足够的。

46. 拘留条件差，例如拥挤、不清洁和不卫生、缺乏食物和医疗援助，不仅会使被拘留者的身体受伤害，而且对其精神健全有深远后果。特别报告员观察到在一些情况下，被拘留者在预审拘留期间遭受蓄意条件差的待遇，以便削弱其意志和逼供招认及逼取情报，或在上法庭时能够说他们不心身不健全和危险，这可使法官对他们减少同情。¹⁵ 特别报告员还注意到在物质条件严重缺乏情况下被长期单独囚禁，又没有或缺乏活动对犯人的心理和精神健全会造成严重损害。¹⁶

47. 酷刑和其他虐待方式多种多样，对身体造成许多后遗症，难以一一细说。不过，最普遍的后遗症之一是失去听觉和视觉、皮肤损伤、骨折、性功能障碍以及

心肺、胃肠、肌骨骼和神经问题和传染病。¹⁷ 必须指出受害者往往遭受多种酷刑和虐待，致使遍体鳞伤。虽然酷刑的一些身体后遗症可以治疗和随着时间转移消失，但其他病症就留下明显的痕迹，有时仍会引起痛苦，受害者将要终身忍受着。这使他们经常回想起受酷刑的遭遇，从而对心理有不良影响。

48. 不给被押酷刑生存者医疗照顾的做法不仅被视为延长酷刑，¹⁸ 而且对其康复会有深远后果。受重伤的受害者因蓄意或缺药而得不到治疗，其病况就会恶化，直至有医务人员料理时为时已晚，不可救药。有若干案例已提请特别报告员注意，其中的审前被拘留者，在被捕或被询问时曾遭受酷刑，但不提供医护服务。

49. 在诊断的酷刑生存者中最常见的心理症状是创伤后应激障碍。酷刑受害者由此所受到的后果有不安睡、烦躁、焦虑、记忆力差、精神不集中和抑郁。特别报告员想要强调每个人对所受的酷刑经历有自己的反应，这取决于各种因素：年龄、性别、家庭状况、社会及经济地位、文化背景等。另一个因素是所谓“对创伤的心理准备”，包括强烈的信念系统(政治、宗教或其他)、对创伤经历给予意义的能力、对创伤性应激的预感和控制能力或在政治活动的环境中对创伤性应激的优先免疫。¹⁹

50. 除个人的心身伤害外，酷刑还会对生存者的家庭和社会生活造成严重影响。酷刑所造成的心身障碍使受害者与家庭，尤其配偶和子女难以恢复满意的关系。酷刑的后果，例如烦躁、恼怒、抑郁等等也会破坏人际关系。恐惧和不安全感、缺乏自信和对应保障一个安全环境的当局不信任等因素也致使难以恢复正常社会生活。长期的肉体创伤、心理问题和认识能力减弱也会削弱生存者的工作能力。不善社交和失业也会导致社会及经济排斥，从而影响到整个家庭，特别是酷刑生存者是养家活口的人。²⁰ 一些酷刑受害者因怕继续遭受迫害、社会耻辱或设法忘记往事或许决定移居他乡。因此，他们和往往其亲属，需要过新生活，但承受由此带来的所有社会——经济及其他后果。

51. 个人的酷刑影响到受害者的整个家庭和社区。当被拘留的亲属获悉他所处的条件或所受到的待遇时，——有意透露，以便对他们施加压力或惩罚他们——由此造成的打击也是一种虐待形式。要是家人不获悉有关受害者的命运和其下落时，就会增加痛苦。为此，特别报告员想要提醒大会人权委员会认为失踪的手段对受害者和其亲属来说可被视为一种酷刑形式。²¹ 此外，一旦受害者获释，其家人可能与一个与过去不同的人相处，他有心身缺陷，需要特别照顾。亲属不一定准备承担这种责任或懂得如何处理。因此，康复方案也应包括酷刑受害者的家庭。一个人因政治活动或嫌疑犯罪而遭受酷刑，他的家庭也会遭到社会排斥和歧视。

52. 酷刑也是对地方社区，并在较大规模上，对整个社会造成打击，特别是广泛和有系统地施加。特别报告员在一些事件中注意到，酷刑的目的是使民众感到恐惧，这是镇压政权的惯技。他关切地注意到使用轮奸手段来使某些族裔群体惊恐不安和蒙受耻辱。他提到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在 Akayesu 的判例中指出“性暴力

是毁灭过程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具体针对图西族妇女并专门推动将她们毁灭并毁灭整个图西人群体”。²² 民众，有时甚至酷刑生存者自己对酷刑现象往往保持沉默，这会产生或加强一种孤独感和误会。酷刑的影响有时甚至连下一代也会感觉到。

53. 妇女所受的酷刑经常包括性暴力，以便使受害者蒙受耻辱和侵犯其人格。除酷刑造成心身伤害外，性虐待对妇女有其他后果，例如会受到性传播疾病感染、怀孕、流产、强迫堕胎或绝育。在许多社会——文化背景下，强奸和性虐待继续使受害者在返回社区和家庭时继续遭受耻辱和排斥。在大多数社会由强奸带来的社会耻辱往往导致受害者的男性亲属排斥她。特别报告员、其前任以及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其原因和后果特别报告员在前几份报告中审查了有关对在押妇女暴力行为的问题，以及性别形式的酷刑的影响。²³

54. 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关于儿童遭受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指控。²⁴ 他指出酷刑和其他形式虐待对遭受暴力的儿童的心理和成长造成严重打击。酷刑对儿童和少年的影响按所受虐待的程度、受害者年龄、发育阶段和认识能力而不同。症状将类似从成人所观察到，但儿童也会形成与其年龄不适合的行为。酷刑也会对目睹酷刑或父母或其他亲属受酷刑的儿童造成重大打击。酷刑生存者的子女会面临由父母受创伤后的行为问题而出现的问题。“对父母是保护子女免遭危险的亲切和重要的人的观念已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在家庭会扮演成人的角色，照顾弟妹保护母亲。这限制儿童参加适龄活动，例如与其他儿童玩以及儿童自己对从亲切的成人获得关爱和与他联系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如儿童没有机会与成人倾诉其惨痛经历，就会延迟他的成长”。²⁵ 特别报告员赞扬人权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积极审查对儿童的暴力行为问题。特别是，他想提到儿童权利委员会 2000 年 9 月和 2001 年 9 月举办关于对儿童的暴力行为为期 1 天的普通讨论会（见 CRC/C/100, 第五章和 CRC/C/111, 第五章）及世界禁止酷刑组织 2001 年 12 月在芬兰，坦佩雷举行的儿童、酷刑和其他形式暴力：面对事实、缔造未来国际会议。他还欢迎指定一名独立专家负责指导关于对儿童的暴力行为的全球研究。

55. 特别报告员了解逃离家园的酷刑生存者往往是少数，而大多数酷刑受害者是没有能力寻求出路或庇护的普通人，他还指出逃离家园的酷刑生存者因被赶走而受更多的痛苦。由此，除饱受酷刑外，成为流离失所、寻求庇护和难民的受害者会经历另一种重大精神打击，感到严重损失——失去家园、财产、工作、亲人、其他密切关系、生活方式、地位，甚至自尊、信任或个人身份。

56. 受害者往往很难诉述其惨痛经历。不过，特别报告员注意到多数受害者感到需要打破沉默。往往公开谴责所发生的事件是认识到身为受害者的第一步。此外，公开诉苦可说是生存者、其家庭和社区治疗的第一步。旨在谴责酷刑的法律和社

会——政治积极行动、使肇事者绳之以法和提供赔偿是在减轻酷刑对直接和间接受害者的打击方面的要素。

57. 必须了解酷刑可对受害者造成的各种打击，以便查明受害者的特别需要和提供适当满足这些需要的援助。对受害者的援助需要紧急提供医疗或照顾，谴责虐待情况，以便防止进一步实施酷刑或受害者的健康恶化。但对酷刑受害者的支助需要更长期的援助，并必须是多方位和跨学科的。特别报告员认为治疗，包括心理治疗，必须与法律和社会援助分开。还应当向酷刑生存者，必要时，也向其社区提供这种援助。

58. 特别报告员认为医疗援助、财政支助、重新参与社会生活、法律补救和在一些情况下，公开承认的结合是关键因素。只有结合这些方面的多学科援助才能保证与违法行为和所受伤害的严重程度相称的充足、有效和迅速的赔偿。²⁶ 以他作为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前特别报告员的身份，特别报告员编制了关于严重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行为受害者得到赔偿、补偿和康复权利的研究报告，在该报告中他指出：“应用法定时限往往会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得不到应得的赔偿。关于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索赔要求不应受法定时效的限制。应普遍实行这项准则。在此方面应考虑到，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后果与最严重罪行有关，而根据权威性的法律裁断，最严重罪行不适用于法定时效。此外，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来说，时间推移并不能减轻他们的痛苦，这是明确的事实；相反，受害者受刺激后神经会更加紧张，因此，长期需要一切必要的物质、治疗、心理和社会援助和支持”（E/CN. 4/Sub. 2/1993/8, 第 135 段）。

59. 特别报告员赞同联合国援助酷刑受害者自愿基金的意见：“基金资助的第一批项目主要是满足酷刑受害者的紧急需要，基本上向其提供医疗和心理援助。后来出现了一种趋势，要向受害者提供全面的援助。事实上，有许许多多的项目倾向于采用一种多学科方法，将[心理、治疗、社会、法律和财政援助]结合起来。把这几类援助结合起来提供时，它们对受害者生活的影响有相互依存、相互加强的作用，与酷刑对个人造成的后果的多型性质相对应。例如，为所受的暴力行为取得赔偿，对受害者的心理有很大的影响。相反，为取得赔偿而出庭作证，会产生严重破坏心理稳定的作用，可能引起情绪低落，因此需要长期的心理辅导。另一方面，社会援助，配以几类特殊治疗法，例如工作疗法，对受害者同时产生心理上和经济上的影响，使他们可以恢复自信，又可以培养新的技能并满足其家属的物质需要。经济援助有时是与医疗援助有连带关系，例如用这种援助来购买药物治疗受害者（A/58/284, 第 35 段）。

60. 特别报告员想要借此机会重申呼吁所有国家、国家和国际社会各方最大限度地支持联合国酷刑受害者自愿基金。他还呼吁支持和帮助康复中心，确保为酷刑受害者提供尽量完全康复所需的手段。他最近收到令人不安的指控，其中指出当局威胁关闭酷刑受害者康复中心。在这方面，他提到人权委员会第 2004/41 号决

议，其中委员会“强调国家法律制度应确保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受害者得到补救，得到公平和充分的赔偿，并得到适当的社会医疗康复服务，并鼓励建立酷刑受害者康复中心”。

注

- ¹ 见人权事务委员会通过的第 20(1992)号一般性意见，第 3 段，第 29(2001)号一般性意见，第 7 段。还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44 号》(A/51/44，第 180-222 段)。
- ² 同上，《第五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44 号》(A/52/44，第 257 段)。
- ³ 第 29(2001)号一般性意见，第 13 段。
- ⁴ 第 31(2004)号一般性意见，第 8 段。
- ⁵ 见人权事务委员会通过的第 20(1990)号的一般性意见，第 20 段。还见欧洲人权法院，Ocalan 诉土耳其，2003 年 3 月 12 日第 46221/19 号判例第 231-232 段。
- ⁶ 检察官诉 Anto Furundzija，1998 年 12 月 10 日第 IT-95-17/1-T 号判例第 148 段。
- ⁷ Chahal 诉联合王国，1996 年 11 月 15 日第 22414/93 号判例第 80 段，第 1996-V 号报告。
- ⁸ 第 63/1997 号通知：Josu Arkauz Arana 诉法国《大会正式记录》(A/55/44)，附件八，第 A.2. 节。
- ⁹ 人权专员，Alvaro Gil-Robes 先生的报告，关于他在瑞典的访问(2004 年 4 月 21 日至 23 日)，Comm DH(2004 年)13，第 19 段。
- ⁶ 检察官诉 Anto Furundzija，No. IT-95-17/1-T，判决书，1998 年 12 月 10 日，第 148 段。
- ⁷ Chahal 诉联合王国，No. 22414/93，第 80 段，1996 年 11 月 15 日判决书，第 1996-V 号《判决汇编》。
- ⁸ 第 63/1997 号来文：Josh Arkauz Arana 诉法国，《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44 号》(A/55/44)，附件八，A 节 2。
- ⁹ 人权事务专员阿尔瓦罗·希尔-罗布斯先生关于他访问瑞典的报告(2004 年 4 月 21 日至 23 日)，Comm DH(2004)13，第 19 段。
- ¹⁰ 特别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235(XLII)号和第 1503(XLVIII)号决议中使用的文字。
- ¹¹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44 号，增编第 1 号》(A/48/44/Add.1)，第 39 段。
- ¹² 比如见《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 7 条(h)项。
- ¹³ 见人权观察，“Empty Promises”：Diplomatic Assurances No Safeguard Against Torture，2004 年，纽约。
- ¹⁰ 见特别是，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235(XLII)和第 1503(XLVIII)号决议所用的语文。
- ¹¹ 还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44 号，增编 1》(A/48/44/Add.1)，第 39 段。
- ¹² 见例如《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 7(h)条。
- ¹³ 见《人权观察》，“不兑现的诺言”：外交保证对酷刑没有保障，纽约，2004 年。
- ¹⁴ 特别报告员感谢专业道德、人权和保健委员会主席(阿根廷)兼儿童权利委员会成员，Norberto Liwski 博士以及酷刑受害者国际康复理事会所提供的资料和文献。

- ¹⁵ 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想要提到其前任，Nigel S. Rodley 爵士关于他访问巴西的报告 (E/CN. 4/2001/66/Add. 2 第 28 段) 和访问俄罗斯联邦的报告 (E/CN. 4/1995/34/Add. 1 第 71 段)。
- ¹⁶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20 号的一般性意见指出“被拘留者或被监禁者的长期单独囚禁是第 7 条所禁止的行为” (第 6 段)。
- ¹⁷ 关于酷刑的医疗方面较详细的意见，见 O. V. Rasmussen 的文章，“酷刑的医疗方面。酷刑种类和与 200 名受害者的症状和损伤的关系，然后医疗人员对酷刑的说明”，载在《丹麦医疗简讯》，第 37 期、补编第 1 号，1990 年 1 月。
- ¹⁸ 特别报告员指出欧洲人权法院认为“没有适当医疗护理是违反第 3 条的待遇” (见 Keenan 诉土耳其，第 27229/95 号公诉，第 111 段，欧洲人权法院，判例和决定报告，2001-III)。
- ¹⁹ Basoglu 以及其他，人，“酷刑和心理健康，研究概览”载在《酷刑的心理健康后果》，由 Ellen Gerrity, Terence M. Keane 和 Farris Tuma 编，Kluwer Academic/Plenum 出版社，纽约，2001 年，第 50 页。
- ²⁰ 同上。
- ²¹ Quinteros 诉乌拉圭 (107/1981)，《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40 号》(A/38/40)，附件十二。
- ²² 检察官诉 Jean-Paul Akayesu，第 ICTR-96-4-T 号案，1998 年 9 月 2 日决定第 731 段。
- ²³ 特别见 A/55/290、A/54/426、E/CN. 4/1995/34 和 E/CN. 4/1998/54。
- ²⁴ 特别报告员和其前任过去的报告，尤其：A/57/173, A/55/290, A/54/426, E/CN. 4/1996/35 和 E/CN. 4/1988/17 已审查了对儿童施加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包括体罚的问题。
- ²⁵ L. Jacobsen 和 K. Smidt-Nielsen 著《酷刑生存者——创伤和康复》，酷刑康复会，1997 年，第 126-127 页。
- ²⁶ 关于赔偿权利，特别报告员想要提到他和其前任过去向大会提出的报告，特别是 A/58/120, 第 29 至 35 段, A/55/290, 第 24 至 33 段和 A/54/426, 第 49 至 50 段。在这方面，还应注意违反国际人权法和人道主义法行为受害者补救和赔偿权基本原则和准则草案 (E/CN. 4/2004/57, 附件，附录一)。